



郑彪/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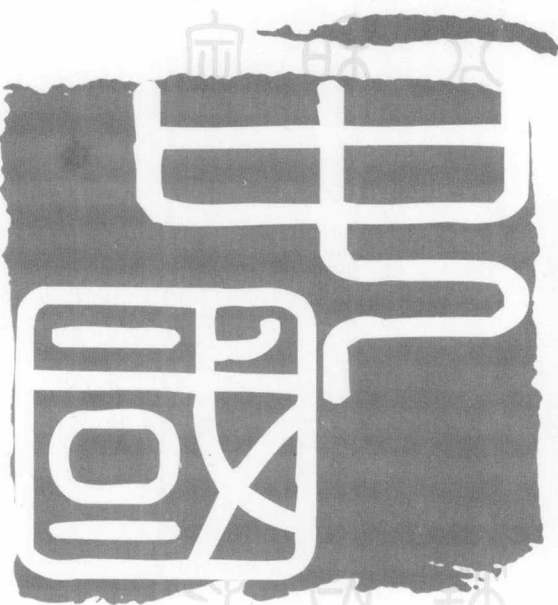
中国软实力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

中国软实力理论的基本架构和思路
“文明冲突”的国际“光谱”分析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郑彪/著

中国软实力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软实力 / 郑彪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117-0165-7

I. ①中…

II. ①郑…

III. ①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1625 号

中国软实力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邓 彤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3(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26.75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世界政治新时代	1
第一节 人类危机的文化根源	2
第二节 世界政治的文化视角	22
第三节 世界文明转型中的东亚和中国	51
第二章 中国道路和“文明冲突”	61
第一节 “文明冲突”的焦点	63
第二节 决定中国命运的两种思路	73
第三节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94
第三章 中国软实力的若干基本理论	108
第一节 软实力理论的若干基本概念	108
第二节 建立中国软实力理论的若干基本思路探讨	135
第三节 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145
第四章 惊涛拍岸	155
第一节 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思想界	156
第二节 近代若干中西文化冲突问题评论	175
第三节 历史的启示	195

第五章 风云激荡	209
第一节 思想界的分化	210
第二节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227
第三节 历史的启示	241
第六章 历史的飞跃和曲折	251
第一节 回眸、反思和方法论（上）	252
第二节 若干理论问题探讨（上）	266
第七章 改革开放和中华复兴	292
第一节 回眸、反思和方法论（下）	294
第二节 若干理论问题探讨（下）	309
第八章 “我们是谁？”	325
第一节 中华民族和文明的由来	327
第二节 中国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慧根再植	346
第九章 读懂西方	377
第一节 西方文化的道德本质	378
第二节 西方文化剖视	395
第三节 看透美国	412

第一章 世界政治新时代

千年之交的岁月，是世界历史的多事之秋。东欧剧变激起历史性海啸的余波尚未平息，美国金融海啸的狂飙巨浪又席卷全球，19 世纪末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百多年来几经折腾，终于在风雨飘摇中进入了它最后的没落时期。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呼之欲出。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历史进程的宽幅震荡，世界风云的莫测变幻，国际舞台的乱象丛生，以及种种地球危机，表明当代人类遭遇深重的文明危机。失魂落魄，精神蜕化，道德沦丧，没有方向，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政治—文化特征。人类正在失去灵魂，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人们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认识充满困惑和疑团。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3266 美元（2008 年），世界排名在 100 位开外，却在 2009 年 4 月 2 日 20 国集团伦敦峰会上成为众望所归的焦点和亮点，证明这个世界其实“不差钱”，差的是思想、道德和正确的价值观。种种危机、乱象都证明一个事实，几百年来由西方文明引领世界的时代已经彻底终结，人类文明面临转型，世界政治进入新时代。

当代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文化作为国际政治资源要素，已经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文化被称为软实力，被赋予更多的竞争色彩。对于中国来说，文化自古以来就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是“人之异于禽兽”的标志。鉴于中国文化固有的独特的人类道德高度，也鉴于世界发展正在赋予中国文化以崇高的人类使命，研究和提升当代中国软实力，需要有高起点、大眼光、大思路。高起点，就是将中国软实力建立在具有道德优势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占领当代人类道德高地，这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对人类

承担的历史责任所在。大眼光，就是要放宽历史眼界，用人类文明史的眼光做中西文化的比较，追本溯源，做一次透彻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比较，这样，未来的发展趋势就豁然开朗。大眼光会出大思路，大时代应该有大思想，不仅能够引领和支持实现中华复兴的伟业，而且要参与引领人类走出危机，赢得未来。这首先要对当代的世界背景，特别是对现阶段“文明冲突”凸显条件下世界体系的变革和中国的前进方向有一个正确而可靠的分析。

第一节 人类危机的文化根源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智库魏征先生说：“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

当代世界科技昌明，但人类在政治文化上仍然不甚成熟。亚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东亚更是人类社会发源至今硕果仅存的古老文明所在。进入 20 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天翻地覆，两次大战打得昏天黑地，惨不忍睹。转眼到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艰难地爬出 30 年代的大危机，医治了肌肤的战争创伤，忘记医治文明，又搭上战后科技革命的“动车组”，繁荣了二三十年，终于旧病复发；东方的超级大国则由于历史相对较短，文明积淀相对不足，加以历史上没有做世界大国的经验等原因，初登大位，不免“纵情以傲物”，于是“骨肉为行路”，自乱阵脚，自我削弱；渐渐东风转了西风，后来竟至搞得国家解体，民族罹祸，人民遭难，殃及全球，世界历史倒退。西风压倒东风之后，文明史更短的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文明更来不及积淀，是近代西方文明崛起中最大的“搭车族”。^①没想到“搭车”竟有如此巨大的投入产出效应，不

^① 近年来西方理论提出“搭车”概念，用以描述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认为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是搭了西方的车。其实“搭车”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由于文明传播扩散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现象，就是发展经济学讲的“后发优势”。亚洲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西方作为后发文明是搭了亚洲文明的车，连基督教都是来自亚洲；西方近代崛起其实搭了中国四大发明的车，18 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搭了中国文化的车，诸如此类的历史旧账算起来是没有意思的。如果要算，美国就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搭车族、暴发户。

仅一举成为最大的暴发户，而且三下五除二地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霸主的交椅岂是好坐的？没有厚德，如何载物？越是居高位，越是烫屁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智库魏征先生说：“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①

一、拨开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迷雾

美国金融海啸彻底摧毁了新老自由主义的神话，《资本论》在西方重新“出土”成为高品位畅销书，人们在想起马克思的同时，也一定会想起百年前作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著名论断的列宁。可是，苏联解体了，满世界鼓噪社会主义“失败”了，“历史‘终结’了”。有趣的是，近百年来西方已经呼唤过两次“历史终结”了。第一次是 19 世纪末。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写道，对于 1897 年的英国资产阶级来说，“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历史终结给他们带来的永久的幸福国家而庆幸。”^②可是转眼之间，世界大战爆发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了。第二次是一百年后，美国教授福山说“历史‘终结’了”，又说“历史没有终结”，是自己看走眼了。到底终结没终结？20 世纪的世界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仅在世人眼里，就是在当代世界形形色色的专家学者和达官显贵眼里，都成了一个不解之谜。于是谣言蜂起，谬种流传，人心涣散。

（一）关于 20 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

美国学者对中国人动辄以千年、百年为历史尺度感到奇怪和不适应，是因为他们的文明历史太短。中国春秋时期国际政治学就很发达，对政治规律有深刻的认识：“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③这句话被黄炎培先生称之为政治周期律，1945 年在延安向毛泽东进言时引用，于是此话不胫而走。西方文明在公元八、九世纪形成，在公元 1500 年以前一直是

① [唐]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② 转引自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47 页。

③ 《左传·庄公十一年》，古汉语“悖”通“勃”。此话在《新唐书》中出现，“悖”已改为“勃”，见《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

世界上相当落后和边缘化的文明。13 世纪中国的指南针传到西方以后，极大地推动了欧洲航海技术发展，于是在 1453 年土耳其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东西方商路发生转移，大航海运动拉开世界近代史的序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诞生。于是西方“其兴也勃焉”，一路风风火火，经过四百年到 19 世纪就发展到了顶峰。19 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标志着西方的文明分裂。20 世纪初列宁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十几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联合也没有能够绞杀苏维埃共和国，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竟然在 20 世纪 30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的背景下蒸蒸日上，别是一番“其兴也勃焉”的景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改变了 20 世纪人类历史的方向和进程，世界文明的重心开始东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等一系列东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彻底改变了东西方的政治力量对比，那时候东风压倒西风，不是唱出来的，^① 而是靠革命战争、工业化和反法西斯战争硬碰硬干出来、打出来的。所以，从战后初期一直到整个 50 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穷是穷点儿，但都扬眉吐气。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形势发生根本改变和由此引起国内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尖锐化的内外巨大压力下发生的“和平演变”，是一场在资本主义理论外衣和制度框架内发生的“静悄悄”的革命，不那么容易看清楚。其实，无论是西方国家 19 世纪末的反垄断，还是罗斯福新政，乃至福利国家以及 20 世纪下半叶西欧和北欧国家的制度演进，本质上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在世界变局和东西方政治对抗（也是核对抗）下，被迫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性质。只是这种政治演变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并被涂上了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油彩而不易辨认。而且西方国家及其政党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戴社会主义这顶“红帽子”，当然也不愿意继续戴资本主义这顶“绿帽子”，于是就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民主主义”、“北欧模式”之类偏向中性的“粉帽子”。这段历史说明，其实是社会主义“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在先，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于后。乔治·凯南聪明过人，实际上他是从西方自《资本论》问世以后到罗斯福新政这段历史中悟出“和平演变”道理的，杜勒斯则是在

① 《东风压倒西风》是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闭幕以后中国创作的一首很有名的歌曲，语出毛泽东在该次会议的讲话中所引用的中国俗语：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政治上实践了这一思想。但是美国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既不情愿也不甘心沿着罗斯福新政的路子走下去，一旦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美英便迫不及待地乘机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号卷土重来，得手一时；之后适逢苏联解体，美国乘机反扑，包括其大搞“金融创新”，其实就具有“金融扩张”的性质，没想到乐极生悲，搞出金融海啸来，收不了场。列宁有一双历史的“鹰眼”，不仅看透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入口，而且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特点是金融资本，看到了银行家和金融寡头的“新作用”。只是列宁没有看到金融可以“创新”到出神入化以至于如此离谱的程度。假如列宁在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当代表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导致全球性金融骗局、泡沫破裂和金融海啸，归结为资本主义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的最新表现。至于“腐而不朽”、“垂而不死”，那是时候不到。列宁做出这个历史论断是在1916年，到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发生，92年不过弹指一挥间。沃勒斯坦“号脉”，现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到21世纪中叶寿终正寝；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启了“世界新时代”。

苏联对于改变20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和推动人类进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中国也起了重大历史和现实作用。苏联解体，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岿然不动，成为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资本主义制度从1825年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至今，经历了多少次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战争危机？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也不会一帆风顺。苏联生存了74年，中间经历了两次热战的严峻考验，却没有经受住冷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60年来成就巨大，也经历了多次危机，走了不少弯路；大小战争打了四次，能打仗出了名，可是这30年糖衣炮弹也吃了不少，都扛过来了。不仅扛过来了，而且闯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越走越自信，越走越亮堂。在当代这个价值颠倒的混沌世界，中国道路有着特殊的巨大的魅力，西方叫软实力。最近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电视讲话中说“中国是发展的榜样”，可能太激动，竟然高呼“伟大的中国万岁！”拉美是美国的“后院”，“后院”总统高呼万岁，其实也是喊社会主义万岁，“前院”总统应当有所耳闻。“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拉丁美洲兴起，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倒退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拾凯恩斯主义这一罗斯福新政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工具，其实还是向社会主义方向举步，承认不承认是另一回事。21世纪人类向何处去？资本主义已经是一条死路，“文明冲突”到底也是死路一条，只有实现文明转型，沿社会主义方向构建和谐世界才是金光大

道。美国人说奥巴马在搞美国特色社会主义，虽是调侃之辞，也不乏真理的元素，原本凯恩斯主义就有马克思的思想。历史发展的真实线索被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大量表面相互矛盾的现象所掩盖，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加以剥离，用自由主义工具根本看不懂，用“文明分析”则混淆是非。需要指出，笔者所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与第二国际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关键的区别在于笔者所说的“和平演变”要以阶级斗争为条件。对此下文还有阐述。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

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在发达国家发生，说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不适合发达国家；而且，发达国家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说明马克思主义没有普遍性，等等。其实不是发达国家没有阶级斗争，也不是发达国家的阶级斗争不够激烈，不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更不是发达国家没有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而恰恰是由于，一方面，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殖民扩张、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社会剩余价值总量大，社会财富积累多，使得政府通过再分配来调节阶级矛盾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 30 年代的危机时刻，也是阶级斗争足够激烈的关键时刻断然采取了明智态度，用强硬手段迫使垄断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做出实质性让步，国家通过一系列立法措施强制性改善劳动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缓和了阶级斗争，使之没有发展到鱼死网破的程度。在这方面，西方不仅有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也有阶级妥协（“光荣革命”）的历史经验。而在俄国这样刚刚摆脱农奴制的极其贫穷落后的国家，面包都没有的国家，阶级斗争在社会剩余价值总量上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而阶级斗争在国内战争时期，特别是在西方十几个国家联合武装干涉的条件下，被迫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方式。离开历史条件，为尼古拉二世争什么人权，其根本是为了否定俄国十月革命。离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离开战前苏联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苏联如何建立起强大的工业能力并掌握足够的粮食，如何能战胜强大和凶恶的德国法西斯？离开这一切，苏联在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的 1941 年就“解体”了，何待 1991 年？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如何可能一跃而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俄罗斯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才实现了自彼得大帝以来对世界霸权的梦想，苏联人乃不知珍惜，思想退化，被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迷魂汤”灌得失去理智和思维能力，酿成苏联解体前后

的一段历史上的惨祸。这样讲，是对历史的高度概括，略去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量问题，包括列宁斯大林时期理论和实践上的许多问题。只是这些问题再大，都属于第二位的问题，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能否定大道理。

同样道理，离开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20世纪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不可能有中国等国家的革命胜利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发展中国家还是殖民地，只有向下沉沦，有啥发展可言？离开这一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没有现在濒于崩溃和多极化的局面。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苏联逐步衰落乃至后来解体，根源是其领导人在理论上放弃和背叛马列主义，实践上先是放弃改革，^①后来又慌不择路，走了邪路。就中国来说，假如没有1949年革命胜利和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原则，中国在20世纪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统一的国际政治实体继续存在，都是问号。至于从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走过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看，包括从改革开放3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看，离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吃苦头；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搞得不好也可能走上邪路。在这些20世纪世界历史、国际政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保持清醒，不能犯迷糊，不能跟着西方跑，为抽象的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和人权等观念所困扰。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中国人必须有强大的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几千年成功的中华文明，也来源于百年来被国内外实践证明成功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世界历史一百多年，还将继续推动历史。这次美国金融海啸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以及关于资本积累的规律等等学说的正确，而且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腐朽性和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论断没有过时。正因为如此，西方国家在2000年公推马克思为“千年第一思想家”之后，这次重新“发现”《资本论》的意义，惊呼马克思仍是21世纪的伟大思想家。所以笔者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的悲剧，马克思主义何悲剧之有？对世界政治、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等重大理

^① 俄罗斯历史学家亚·维·菲利波夫写道：“勃列日涅夫对待柯西金关于改革管理体制的建议的反应是：‘他在想些什么？改革、改革……谁需要这个？谁又懂这个？要更好地工作，这就是一切。’”引自（俄）亚·维·菲利波夫著，吴恩远等译：《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论和实践问题，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全局缺少把握，对苏联历史研究不够，对许多问题的开掘缺少深度，有一点材料，就敢下结论，这是靠不住的。^① 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属于有一点材料就下结论，结果没有几年，又自己否定自己。

亨廷顿认为，随着冷战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就西方而言，公开贬低意识形态，暗地里自己极为重视意识形态，特别“讲政治”，这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需要和一贯手法。说到底，“主义冲突”也好，“文明冲突”也罢，反华才是实质。所以，意识形态和文化都有用，都重要，意识形态也是文化。亨廷顿这里说“意识形态不再重要”，是相对于文化而言，而且有特定的含义，不可误读。意识形态和文化都是重要的国际权力资源要素，过去、现在和今后都是如此。

从历史经验教训看，极“左”派在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理论太偏激，主观上又急于求成，实践上便误入歧途；而且一错再错，一错到底，总体看在理论和实践上没能打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右派往往背离马克思主义，或者原本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主观上怀疑甚至敌视马克思主义，迷信西方自由主义，实践上追求美国模式，实际上是延续历史上全盘西化的错误思路，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望远；又由于急功近利，至多就只能走对一步棋，只看见“市场”二字，两三步棋以后就注定陷入新自由主义泥坑，就露怯，就技穷了。2002年以来，面对中国建设以及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堆积如山的重大问题进行改革，自由主义学派集体失语，对构建和谐社会既缺乏应有的热情，更缺乏积极的建树，就是明证。只有中国共产党，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上深通中国国情，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既能看对，又能做对，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为国际“大气候”所左右，能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种领袖人物改革开放以前有，改革开放以后也有，但是这种主张，往往需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比较，经过“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才可能得到承认。

（三）关于阶级斗争

20世纪60—7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曲折，进入低潮，于是新自由主义

^① 郑彪：《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兴起。这一时期美英等国家实行的削减人民福利、减少（富人）所得税和实行非国有化以损公肥私等政策以及在国际范围内实行大肆破坏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政策表明，新自由主义具有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政治上反攻倒算的性质，而国际范围内围绕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既有西方集团内部斗争的性质和地缘政治斗争的性质，也有南北矛盾的国际阶级斗争性质。在冷战期间美苏战略缓和条件下，泛起了和平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自由、民主和人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工具，苏联出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个运动的背景和人员复杂，观点瑕瑜互见，但是它把苏联衰落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是极其错误和荒谬的。关键是在冷战背景下，这个运动客观上为西方所利用，成为苏联的掘墓人。苏联解体后，其中许多人发现自己成为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了俄罗斯民族的罪人，痛心疾首，悔不当初。毫无疑问，冷战同样具有国际阶级斗争性质。80年代这股以“告别革命”为口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泛起，乘着新自由主义的西风，在90年代中期以后甚嚣尘上，流毒甚广，不仅全盘否定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而且发展到抹黑和否定中华文明史，甚至发展到否定中华民族，自诬为“人种不行”。这股思潮的传播，来头之大，范围之广，后果之严重，为近代中国历史所仅有。中国的这股思潮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背后是同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一时期西方思潮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泛滥的严重后果，近年来在政治体制改革争论中得到了突出表现，最集中地表现为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的领导，以致最近最高层发出“党校要姓党”的警告，这都是很不寻常的信号。

所谓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无非是现实中的阶级斗争在观念上的反映和在政治上的结论，所以贬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目的是否定阶级斗争。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来说，对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说，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意义之重大，不容否定。这里引用笔者在拙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一段文字：“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和历史前提，对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必须肯定，不能动摇。至于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阶级斗争是否一定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形式，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在苏维埃俄国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暴力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说过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其所以历史证明可以采用和平演变的形式（还没有得到最后证明——引者），也是以东西方政治对抗

的国际政治斗争为前提和历史条件的。离开基本上是以国内外阶级斗争为背景的苏维埃俄国的诞生，离开苏联发展所带来的世界的革命性变化和由此形成的强大的国际政治压力，离开（核武器条件下的——作者）东西方政治对抗，发达国家的和平演变就失去了外部政治条件和内在依据，是不可能实现的。坚持这一点，不仅是为了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划清与第二国际的界限，也是由于坚持这一点，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只要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即刻会从‘科学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社会主义’（或蜕变为资本主义，例如在前苏联东欧地区），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也将永无出头之日，而且有灭顶之灾。在当代各种危机都已‘全球化’的条件下，所谓没有‘出头’之日，意味着必有‘死定’之日。至于在当代力量对比不利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理论如何概括和形成，实践的战略、策略和政策如何制定，如何量力而行，因势利导，有理、有利、有节地循序渐进，步步为营，这都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只要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放弃斗争，发展中国家就‘死定’了，就是苏联一个超级大国，最后也是这么‘死’的。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一个以斗争求和谐的过程。对于后起国家来说，是先求生存，再求发展，逐渐强大以后才有资格和实力求和谐，否则是求之不得的。”^①

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海啸，新自由主义宣告彻底破产，历史又在呼唤马克思和列宁，在美国目前则是呼唤罗斯福。啥时候形势发展逼出一个“罗斯福”，或者逼出一个美国“列宁”来，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金融海啸是催化剂，布热津斯基们已经报警，接下去还要看阶级斗争、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如何推动美国形势和世界形势发展演变。

二、从美国金融海啸看西方文明危机

当代人类面临各种危机的根源在于失去平衡：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失去平衡；自然界本身失去平衡；人类内部失去平衡；人的自身也失去平衡。其哲学根源在于物质与精神失去平衡，其文化根源在于500年来逐渐崛起的西方文明在将人类引入工业社会，不能善其后，更无力引导人类进入信息社会。2008年爆发的这场美国金融海啸给世界各国带来的严重灾难，再次有力地证明了这

^① 郑彪：《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91—92页。



一点。

500年来西方解决了一己的富裕，却造成了另一个大世界的贫困，更没有解决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相反，现代化、全球化和美国化日益将精神价值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排挤出去，而为近乎犬儒主义的理性（纯世俗的利害盘算）、为信息、为所谓数字化生存所取代，美国正带领人类走向毁灭的边缘。西方文明的这个病是无药可医的，只能激起其他文明的仇视和反抗，无法成为人类文明的引路人。《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①这个古老的政治学规律，西方国家至今不懂。《大学》还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西方文明的病其所以无药可医，就在于太贪心，完全“不知止”，终于不能安，也终于不能得，正在得而复失。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挟武力推行全球化，到20世纪世界分崩离析，已经进入死胡同。虽然看起来现在的乱世仍将持续，但是种种情况表明，人类必须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做出最终抉择，未来世界秩序和社会无疑是以天下一家、大同世界为基础的，这是真正的全球化思想。这种思想和文化，西方没有，必须他求。

美苏争霸，看似美国胜出，其实两败俱伤；苏联垮在明里，美国伤在暗处。美国为打败苏联落下的内伤，主要是道德破产和债台高筑，为今天的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孤注一掷，终于乐极生悲，于是绑架全球。这个道理并不深奥。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中写道：“《易经》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美国不积善而积恶，衰落更加不可避免。美国一直处心积虑地想将中国引向金融危机和社会动乱，没想到自己的金融也出现了次级债危机。美国的经济泡沫已经接近破裂，如果引发全面金融危机，导致美元信用崩溃，那后果就很难设想了。布什政府其实是在孤注一掷，绑架全球，做一场世纪豪赌，想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搞定世界，梦想注定破灭。”^②《易经》往往被人拿来占卜算卦，笔者这样说，既非为美国占卜，更非诅咒，只是一种科学分析，没想到一年后竟然“应验”，美国真就爆发了金融海啸。这次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大大加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走向崩溃，而且再次宣告西方文明破产。

① 《四书·大学》。

② 郑彪：《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50页。

1. 金融海啸不仅是美国财政金融破产，更是政治和道德破产。

这次金融海啸表面上是美国金融监管问题，根源在政治层面。实质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由于苏联解体而利令智昏，试图赢家通吃，进而导致利益勾结突破了制度防线、道德防线和金融监管，再进而导致金融泡沫空前膨胀，经年累月，终于爆发。美国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国家信誉为代价放纵某些寡头大亨大发横财，而且事先明知会引发危机，早就准备好拉闸放水，向全世界转嫁，拉全球垫背了事。政治上美国10年内连打3场战争，金融上再这么干，风险极大，后果严重，当局不会不知道。但是政府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其实是拿美国国运作赌注进行一场超级政治赌博。美国这样做甚至连西欧传统盟友的利益都不顾，自私到极点。2009年3月美联储公开动用3000亿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等于宣布美国财政、政治和道德全面破产。

这次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震荡，表明美国是当代最大的巧取豪夺者，也是最大的诈骗犯和强盗。巧取的极致，就是全球性诈骗（战略欺骗、新自由主义陷阱、金融诈骗，等等）。次贷危机的实质就是诈骗，美国的金融创新为之提供了平台和工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有些所谓“金融创新”只是“隐藏了系统化融资的规模，将风险变得不透明，正是这些发明才使这次经济危机变得比早期的经济危机更加戏剧化。”他认为，9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繁荣是没有任何技术增长的繁荣，是一场金融金字塔的骗局，“这是一个经典的庞茨（Ponzi）骗局”。^①他说：“投资基金购买作为投资组合一部分的新的金融衍生品。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案例发现，次级贷款和它的资产被横向和纵向切成许多小块，然后重新组合，这些最后的产品会和其它类似的人工制造的金融产品混合在一起，抛售到市场上——没有人能够很轻易地确定这些最后投资证券组合中哪一部分属于风险资产。”他称这种“精美的规范套利”投资机制本质上是“老鼠会”，是“新形式的会计诈骗。”^②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2006年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债务与否定》一文，揭露了美国经济的“寄生性”。克鲁格曼发现美国的进口超过了出口的57%，也就是说美国人在全球市场的消费超过了其收入的57%。他指

① Charles Ponzi, 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金融诈骗犯，首创了“老鼠会”的骗局。

② 2008年7月在曼彻斯特大学举行的经济政策创新会议上提交的论文：《2007/2008金融危机以及微观经济学后果》。